

文汇讲堂

传播人文关怀 汇聚高端名流 讲得通俗易懂 堂中尽情交流

2014年4月12日 总第69期(“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与我们的时代”第4期) 报名、话题网页:<http://www.whb.cn/zhuhan/jiangtang/>



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



童世骏

主讲嘉宾

1958年出生于上海,1982年、1984年分别在华东师大获学士和硕士学位;1994年在挪威卑尔根大学获博士学位。现任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中共华东师范大学委员会书记,兼任《哲学分析》(双月刊)总编、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上海市社联副主席等。他发表有《马克思恩格斯同时代的西方哲学》(合著)和《现代化的辩证法:哈贝马斯与中国的现代化讨论》(英文)等著作,《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哈贝马斯著)等译作,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中英文论文100多篇。

“东方讲坛·文汇讲堂”哲学演讲季
哲学与我们的时代

4月12日	嘉宾:童世骏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凡俗生活与理想境界
4月26日	嘉宾:俞吾金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历史主义与当代意识
5月18日	嘉宾:高瑞泉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照亮文化精神
6月1日	嘉宾:陈卫平 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题:中国哲学的正能量
2月22日	嘉宾:吴晓明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与我们时代的当务之急
3月8日	嘉宾:王德峰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马克思哲学与现代资本文明
3月22日	嘉宾:张汝伦 复旦大学教授	主题:哲学的意义与批判的价值

世俗时代的人类该如何自处

西方世界自进入现代以来,宗教的地位日趋衰落。信仰在西方人的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边缘。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后,西方人所面临的危机,正如同斯宾格勒所揭示的那样,是无可挽回的“西方的没落”。而中国在被迫打开国门后,传统的由儒释道三家构建起的基本价值也崩溃了,然而无论是“全盘西化”,还是“回到传统”,在眼下似乎都已不可行。那么在这样一个全面世俗化的时代,人类又该如何自处?韦伯和福山给出了不同的答案。

韦伯:祛魅后的绝望

韦伯致力于研究西方社会的理性化过程,并认为理性化过程的核心就是“祛魅”或“除魔”即人们不断把宗教世界观及宗教伦理生活中一切带有巫术的知识或宗教伦理实践要素(如通过宗教冥思或带有巫术性质之圣礼仪式等救赎手段)视为迷信与罪恶而加以祛除,人日益从巫魅中解放出来,获得自己理解世界、控制世界的主体性地位。祛魅后的世界既取得了高歌凯旋的物质和文化成就,也带来了许多深重的问题和危机。卡尔·洛维特认为,韦伯所关心的就是在一个“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的“祛魅”的世界中如何拯救人最后的尊严。

祛魅总的来看是一个进步性的历史事件和发展过程,它不仅孕育了资本主义精神,“哺育了近代经济人”,创造了巨大的物质财富,而且发展起了实用理性和科学技术,使人们处于不断发展和创新不已的无限之中,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和人们的观念。但是,世界的祛魅也带来了一系列深重的问题和危机。韦伯对这些深重的问题和危机也作出了颇富创发性或前瞻性的揭示与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救治之策。

为了拯救祛魅后身陷诸种危机的世界,韦伯渴望建立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和、信念伦理和责任

伦理有机结合的伦理系统,使理性与自由、秩序与个性结成友好的关系。当代社会由于其失却了终极价值的依托,失却了对生命存在意义的反思,因此工具理性最终走向了“理性的暴政”,现代人被禁锢于现代化的迷宫中而难以逃脱。韦伯对这一前景深感忧虑,他渴望能够重建价值理性的尊严以弥补工具理性的片面和缺陷,渴望能够重建信念伦理的体系以化疗责任伦理的偏弊。但是,他又处于深深的忧患之中,感觉到似乎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在现代社会再也难以握手言和,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再也无法和谐相处。这使他陷入了难以超拔的“绝望”。而惟有绝望,才能正视人类面临的历史窘境,为走出历史的窘境作不遗余力的抗争与苦斗。

福山:自由民主满足获得认可的欲望

随着冷战结束,全球一体化的趋势愈演愈烈,现代性作为不同于传统历史概念和历史演化的总体性特征,引发了人们对历史规律的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福山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从黑格尔的世界哲学思想出发,重提并进一步阐释了“历史的终结”的概念。福山在《历史的终结及最后之人》一书中,对历史的现代化进程和历史终结时的现代性特征作了深刻的探讨。

福山认为与19世纪整个西方世界普遍的乐观主义相比,几乎整个20世纪的西方社会都深深的陷入了历史的悲观之中。但是,20世纪下半叶尤其是90年代以来,世界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出现邪恶,却有明显的改善,尤其是80年代末共产主义出现大规模塌方,这些国家要么进入自由民主国家、要么改头换面成为另外一种独裁制度,但无论如何,全球范围内独裁、专制主义危机四伏的境地却让人们开始重新反思这个世纪的历史所产生的悲观。

福山认为随着人类走进20世纪末,专制主义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只留下唯一的一个竞争者作为具有潜在的全球价值的意识形态,那就是自由民主制度。自由民主制度的发展虽然不是一帆风顺的,但必将朝着这个方向而不断发展。福山提出一种世界普遍史,“这种历史不是我们所知道的所有人类事件‘流水帐’式的百科全书,而是一种尝试,试图想在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过程中发现一种有意义的模式。”而“历史的终结”就是所有世界普遍史的题中之义。历史的某个重大事件只有产生更大的终极或目标才会更具有意义,实现这一目标必然会推动历史走向终结。

福山借用了黑格尔的观点:黑格尔认为历史进步不会无休止地延续下去,而是随着现实世界中自由社会的建立走到一个终点,这意味着历史的终结,由此黑格尔把历史定义为人走向更高的理性和自由的进步过程。黑格尔同时提供了一个以“获得认可而斗争”的精神机制来认识历史进程。在黑格尔看来,人类历史的基本动力是获得认可而进行的斗争。福山从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中的“主奴辩证法”思想出发,认为“人强烈要求获得作为‘人’的认可,即作为一个具有一定价值和尊严的人而被认可,这种价值最初与他甘愿为自己的名誉而进行斗争,甚至甘冒生命危险联系在一起。只有人才有能力战胜他最基本的动物本能、尤其是自我保存的本能,追求更高级、抽象的原则和目标。”

在福山看来自由民主是一种本质上的善,因而能引起全世界人的共鸣,是所有人类的共同追求和目标。他认同黑格尔的观点,认为现代自由主义之所以能够满足人对善的追求,是因为真正能使人感到满足的并不是物质的丰富,而是对其地位和尊严的认可。在这历史终结的时代,“最后之人”将是由自由民主制度打造出来的现代公民。

本版整合 谢怡华

尼采:上帝死了

尼采在其著作《快乐的科学》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宣告。一个疯子在大白天手提灯笼跑到市场里,向人群宣告——“上帝死了”,而杀死上帝的凶手正是人。

这句话不仅震惊了书中市场里的听众,也令当时的欧洲人惊诧不已。确实,尼采所关心的也正是当时已进入现代的欧洲人。上帝已死,意味着文明从传统的信仰向理性主义与科学主义的转化。而之前,基督教道德提供了共同的信仰,以此产生的道德秩序是欧洲人数百年来社会与文化生活的总规则。

其实,尼采正出生在一个虔诚的宗教家庭氛围中,他的父亲是路德宗的牧师。然而,成长在这样的家庭中却让他意识到,基督教道德意味着某种损害和贬损。而当他提出“上帝死了”,他并不以此为悲。对他来说,上帝之死意味着,人不再需要被内在的“罪感”所困。他认为,凡俗的生活较之被宗教所限制的生活来说,要更快乐、更有意义、也更健康。

毛泽东:彻底唯物主义

毛泽东创立的彻底唯物主义,其中有三个组成部分,这就是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人民民主的历史观、全面发展的人生观。

作为实事求是的世界观,他的观点不同于中国传统哲学,也不同于西方哲学。他承认客观现实,而且同时承认一切客观现实都存在于对立统一的矛盾运动之中,都是联系的、发展的、变化的,因而都是可以分析的,可以认识的,可以改变的。作为人民民主的历史观,他的观点不同于欧美模式的民主,也不同于苏联模式的民主。他承认民主是利益的平衡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他总是追问谁作主、为了谁、谁受益,强调通过民主保证人民大众的核心利益。而作为全面发展的人生观,他既不同于信奉私有制的人,也不同于旧道德家。把人放到现实的、发展的、丰富的社会关系中来理解,提出了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生观。这与马克思关于人的全面发展观点一脉相承。

冯友兰:极高明而道中庸

冯友兰认为中国哲学有一个主要的传统,有一个思想的主流就是求一种最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最高的,又是即于人伦日用的,因此是追求“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之所以是一种追求,就是因为世间与出世间、高明与中庸本来是对立的,如何达到“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这一“而”,即化对立为统一,是一个需要求解的问题。能称为中国哲学精神的,必然是在中国哲学中处于主流且具有普遍意义的,进步的、精华的部分。

中国哲学就是在对“极高明而道中庸”的这一“而”的“求解”中体现其精神的。所以虽有某些派别要么不够高明,要么不够中庸,但其都有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追求。在中国哲学史的演变中,各阶段、各家都曾部分地对这一问题给出过自己的解释。

本期讲座知识点介绍